责任编辑/蒋楚婷
E-mail:jct@whb.cn

飞鸟的影子

——读《史学理论手册》

■李 娟

距今一万五千年以前，在位于今天法国拉斯科的洞窟中，一些原始人类正在岩洞壁上勾画着野马、野牛和鹿。1940年，当这些史前画作重现天日时，举世震惊。关于原始人勾画这些动物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但无论是倾向于宗教仪式、日常行为还是艺术想象，总逃不脱“记录”这个概念。将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甚至想象中的事物，用尽一切方式保留下来，这也许是人类的本能。当人类的历史足够久远时，这些记录中有一类便脱颖而出，它是对往昔的回忆、总结和反思，对现实问题进行解答，甚至定义着一个族群的来龙去脉，只是那时它还没有“历史”这个名字。

荷马吟唱、希罗多德朗诵、太史公奋笔……时至今日，历史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认同途径，建构、解构和重构着我们对于自身、社会和世界的认知。然而，即便在古老年代，对历史叙事的质疑就已经产生了。古代哲学家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就在《皮浪主义要旨》中指出，人不可能知晓过去。意大利哲学家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更是在《历史十谈》中重点讨论了“历史的真相”，主要聚焦于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之间存在矛盾的问题。菲利普·锡德尼爵士在《诗辩》中更是赤裸裸地嘲笑史学家是“住在故纸堆里的人”，“很大程度上明显是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赋予自己的研究以权威性”。更不要说中国古代发达的史学批评和文献考证，不断对历史叙事进行的质疑和批判。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事件的描述和解释存在巨大差异，这是让人对历史叙事产生质疑的根本原因之一。

十九世纪，随着历史学科化、专业化和制度化的进程，这片同历史叙事形影不离的阴影，变得愈发浓重。为了消弭这片阴影，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斗争良久。然而，就是在这漫长的斗争中，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片阴影源于历史学本身。史学家就如同一只翱翔天际的飞鸟，俯瞰着人类历史的曲折变化，却永远飞不出自己的影子。这影子，便是我们的认知方式、价值立场、叙事风格等等，简而言之，就是我们的主观性。今天，我们把这一领域的研究称之为“史学理论”，也是《史学理论手册》的主要内容。长期以来，这一战场中的主要问题是，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同历史知识的主观性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鸿沟大到一度让人丧气，无论是描述、解释还是证据，历史叙事的各个方向都笼罩在主观性的阴影之下。历史与文学区别何在？失去客观性的历史还是历史吗？这些问题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历史死了”这句后现代名言。

《史学理论手册》
[加]南希·帕特纳
[英]萨拉·富特主编
余 伟 何立民译
格致出版社出版

然而奇妙的是，随着所谓后现代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非但“历史没有死去”，对于那片笼罩历史学的阴影，也有了更深入的认知。正如《史学理论手册》中所言，“史学理论是一套严密规整但又有所弹性的框架组织，支撑着历史知识分析，并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能获得怎样关于过去的知识，确切地说，即历史知识是如何被建构、编排和表达的”。也就是说，史学理论关注的不再是往昔，而是我们自身，是我们思考和表达往昔的方式，是人类的历史思维本身。也正是借由后现代史学理论的东风，现代历史学科才得以或主动或被动地拆解所谓“科学历史学”设下的诸多藩篱，挖掘出历史思维中的丰富元素，重新实现同宗教、文学、艺术和政治的种种联系，发现传统史学的盲区，在深度和广度两个层次上完成历史学的飞跃。

飞鸟的影子不是阴影，而是镜子，是人类思维的关怀。世间万物，唯有打上思维的印记，才能进入人类文化的范畴，花草树木如是，历史亦如是。我们透过这阴影之镜看到的，终究是自己。我们通过历史传达的，除了人物和事件，更重要的是思维和价值。也许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会有曲终人散的一天，犹如人类历史上那些曾经出现过、闪耀过的学科门类，但是作为一种思维形式的历史，相信会与人类同在。数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夜晚围坐在火堆旁，靠讲故事打发漫漫长夜；现代人捧着纸书、电脑或kindle，检阅历史。在经历了若干周折之后，历史学仍要回到自己的过去，从学科诞生之前、蓬勃多样的历史思维中汲取养分，正如该书最后一篇文章所阐述的——《应用基础：亚里士多德的叙事理论和后现代史学的古典源头》。

最后，想就翻译说几句。非史学理论研究专业的读者，必定会被书中各种理论术语、复杂的句子结构和不符合中文的表达形式所吓到。这也是我们所有学术翻译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语言是存在的家，学术翻译的家有两个，是背叛母语还是背叛外语，实在令人头疼。我赞成该书译者的处理方式，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直译加语序调整的方式，尽可能保留学术语言的原始风格。正如当年佛经东传，高僧大德们在译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将源自梵文的词句和语法结构纳入了汉语。史学理论在中国仍旧是非常小众的学问，即便在史学界也是如此。这本手册集合了众多西方史学理论专家的作品，引入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和问题，值得对往昔和历史感兴趣的人一读。

二十世纪，被飞速改变的环境和社会

——读《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

■常龙川

《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世界闻名的环境史大家、乔治敦大学环境史教授、今年7月被选举为美国历史学会新任主席的约翰·R.麦克尼尔的代表作。约翰·R. 麦克尼尔的父亲威廉·麦克尼尔是享誉世界的《西方的兴起》《世界史》等名著的作者，约翰·R.麦克尼尔本人的作品，除了这本书，还包括《蚊子帝国：1620—1914年大加勒比海地区的生态和战争》《全球环境史指南》《大加速》等，都受到学界和大众读者的广泛好评。

《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英文版出版后，曾被《泰晤士报》评为最优秀的科学作品。这本书翔实地评述了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生存发展环境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作者在序言中指出，就环境变迁的强度和人为因素的集中程度来说，二十世纪都超乎寻常——在一个并不算很长久的时间内，借助丰沛的廉价能源与水源，又抓紧了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世界许多地区的经济超速增长，人口规模也实现了极大的扩容。总体上，人类生存发展对于环境的介入程度和影响程度，都变得更深，出现了许多不良反应，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环境意识的觉醒，也在促成环境保护的提速。

该书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有关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的叙述中，麦克尼尔着眼于地球的各种“圈”，包括岩石圈、土壤圈、大气圈、水文圈、生物圈，解析其分别受到人类影响的情况。从岩石圈、土壤圈的存在状况来看，随着化学工业、采矿业的发展，二十世纪在全球范围内上演了急速的土壤污染、山体破坏，并诱发了频率远超过去的相关自然灾害。并且，随着化石能源的高效利用，古代以来就存在的屯垦，到了二十世纪突然提速，也加剧了土壤侵蚀恶化的情况，以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出现了红土灾难，而菲律宾、卢旺达等国家在二十世纪因屯垦开发所引发的环境问题，迄今也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如果再将农业中滥施化肥所造成的土壤破坏纳入考量，地球岩石圈、土壤圈在二十世纪之中遭遇的就是超速的全面破坏。

《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
[美]约翰·R.麦克尼尔著
李芬芳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地球区别于其他许多行星，并成为孕育文明的重要保障，就在于拥有大气圈。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大量的废弃物被排入大气圈。书中历数了英国伦敦，日本，美国匹兹堡、洛杉矶，德国鲁尔等国家和城市在二十世纪的空气污染史，归纳了空气污染作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副产品而带给人类的严重伤害——不仅在于污染空气对于人类健康、动植物生存环境的直接伤害，而且还可能对于大气圈的存在构成毁灭性的剥蚀冲击。

书中详细叙述了地球水文圈、生物圈在二十世纪受到的损害，包括水源过度开采使用与水源污染、二十世纪全球各地大规模兴建的水利工程所带来的后遗症、生物圈存在条件被改变所带来的物种灭绝及疫病传播，等等。麦克尼尔感慨地说：“在二十世纪，人类不只诠释了生物的进化，还深深地改变了它。”其影响很可能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才能反映出来。同样的，人类活动造成大气圈臭氧层受损，让海洋中部分微生物死亡，由此带来的海洋生态环境变化及后续问题，也必然会通过一个缓慢却坚定的节奏反馈及呈现。

全书第二部分讨论人类社会在二十世纪呈现出的急速变迁，包括空前的城市化和“人口保障”、能源开发利用与科学技术进步、观念嬗变更迭潮流。全球人口在二十世纪增长惊人，如亚洲人口就从1900年的九亿三千七百万，增长到世纪末的近四十亿，非洲人口激增六倍，其他大洲的人口也呈现快速增长。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大规模人口迁徙潮流也在全球范围内涌动，越来越多的人口走出农村、草原、山区而聚集在城市。城市化潮流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促进了多方面的变革创新，实现了文化繁荣，但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资源和能源消耗。书中指出，“二十世纪在能源机制、科技与经济方面的变革均息息相关”，能源大规模使用带来了环境的大幅度变化，更让全球各区域更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麦克尼尔指出，二十世纪也成为人类自行建构的大规模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实验阶段，各种政策、观念与政治结构掀起交叠的漩涡，并与科技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构成互动。

在二十世纪的不同时期，已经有过不少人呼吁要警惕社会危机、生态危机。麦克尼尔认为，尽管危机警告反复提出，但一定程度上却落空了，因此人类社会仍应保持足够的自省与警惕，加紧导入更洁净的全新能源机制，加速人口转型，要更加善于通过科技创新来解决提升生活福祉与兼顾减少能源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的核心命题。“只有从自身做起，不厌其烦地改弦易辙，才能避免严重伤害”。